



## 《資治通鑑》戰爭敘事略說

### ● 施寬文\*

中國傳統史書之撰著，多不因純粹之學術目的，而著眼於政治之「致用性」，亦即「事」的成敗得失之資鑑法戒，與「人」之忠奸賢愚的褒貶勸懲。司馬光編撰之《資治通鑑》，書名係宋神宗所定，所謂「明乎得失之迹，存王道之正，垂鑑於後世者。」<sup>1</sup>云云，具有明確的政治鑑戒之目的，故其書特詳於國家盛衰、政治理亂之所由，宋元之際的胡三省已具言之。此外，明末大儒顧炎武嘗云：「司馬溫公《通鑑》承左氏而作，其中所載兵法甚詳。凡亡國之臣，盜賊之佐，苟有一策，亦具錄之。」<sup>2</sup>蓋因「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。」<sup>3</sup>，關涉政權、朝代之興亡，《通鑑》因之極為重視戰爭敘事。

《通鑑》敘述戰爭，大致可以三方面言之，即戰前之政治與兵謀，戰事之描述，以及戰後勝負雙方情形的概要敘述。其中最重要者當屬戰前敘事，每每著墨最多，注目於雙方政治情勢、人君與揆宰之賢愚，司馬光蓋以為決策者與政治之清濁良窳，實戰爭成敗之關鍵。茲以《通鑑》卷一〇五載述之「肥（淝）水之戰」為例，簡要說明之。

東晉孝武帝時期，北方的前秦苻堅政權曾經統一華北，局勢大好，史云：「東極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<sup>1</sup> 宋神宗趙顛御製〈序〉。見〔宋〕司馬光編著，〔元〕胡三省音註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目次前頁29、頁30。

<sup>2</sup> 〔清〕顧炎武：《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），卷27，頁737。

<sup>3</sup> 〔德〕克勞塞維茨：《戰爭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2），頁43。

滄海，西併龜茲，南苞襄陽，北盡沙漠。」<sup>4</sup>，國勢如日中天，然而，卻在西元 383 年的肥水之戰中，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而一敗塗地，苻堅不久即身死而國亡，距其於西元 376 年先後滅前涼與代，一統北方，不過短短七年。因此，「肥水之戰」極具資鑑價值，而其價值與其說是軍事謀略之借鑑，不如說是人君之行事與政治之鑑戒。《通鑑》敘述此事，始自太元七年（382）十月的「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」之南征廷議（卷 104，頁 3301），終於太元八年（383）十一月謝安與客圍棋，得知大捷，「還內，過戶限，不覺屐齒之折」（卷 105，頁 3314）<sup>5</sup>，其間以眾多篇幅側寫苻堅之剛愎，以及其時前秦內部政治之隱患。

關於前秦當時政治之隱憂，以及東晉政治狀況，司馬光借由太極殿廷議群臣之口道出，如關於東晉政治，權翼：「今晉雖微弱，未有大惡；謝安、桓沖，皆江表偉人，君臣輯睦，內外同心，以臣觀之，未可圖也！」石越：「彼據長江之險，民為之用，殆未可伐也！」（卷 104，頁 3301、頁 3302）「君臣輯睦，內外同心」、「民為之用」，皆說明其時東晉政治即使不盡如人意，猶稱清明，且社會安定。至若前秦在強大表象之下的隱憂，則由陽平公苻融與苻堅的私下對話道出：「我數戰兵疲，民有畏敵之心」、「陛下寵育鮮卑、羌、羯，布滿畿甸，此屬皆我之深仇。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，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，不可悔也。」（卷 104，頁 3303）除了指出前秦長年征伐，軍心厭戰之外，更指出其所征服的各族勢力，皆心懷不軌，觀釁伺隙，蠢蠢欲動！

至若身為人主的苻堅，其性格之缺失，則見諸其在南侵東晉的師心下，對於權翼、石越、苻融、太子苻宏、沙門道安、張夫人、幼子苻詵，或由人事、或由天象、或由地理、或由災異，在在極言南征之不可時，其於道理難以辯駁者若非「嘿然良久」，即云「吾當內斷於心」，否則即作色駁斥，或是「不聽」，或是以為「軍旅之事，非婦人所當預」、「天下大事，孺子安知！」諸多愾諫的言行，鮮明地呈現其為人之自以為是、剛愎自用。此外，太元八年（383）七月、八月前秦開始戰前之動員與布署，苻堅大言：「其以司馬昌明（按：晉孝武帝司馬曜）為尚書左僕射，謝安為吏部尚

<sup>4</sup> 見湯用彤：《校點高僧傳》，收入《湯用彤全集第六卷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卷五，頁 149。

<sup>5</sup> 本文所引《資治通鑑》原文、文後所標頁碼，皆據北京中華書局 1956 年出版之《資治通鑑》。

書，桓沖為侍中；勢還不遠，可先為起第。」以至於始終冷眼窺伺、圖謀復國的鮮卑慕容氏私下相謂曰：「主上驕矜已甚，叔父（按：慕容垂）建中興之業，在此行也！」則又呈現其人臨事之驕狂、輕敵。

因此，與其說前秦在肥水之戰中是因為戰術上的失誤而慘敗，不如說是敗於人主苻堅的剛愎、自大與驕傲，此亦見諸《通鑑》對於此一戰事的描述：

秦兵逼肥水而陳，晉兵不得渡。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：「君懸軍深入，而置陳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計，非欲速戰者也。若移陳少卻，使晉兵得渡，以決勝負，不亦善乎！」秦諸將皆曰：「我衆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萬全。」堅曰：「但引兵少卻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鐵騎蹙而殺之，蔑不勝矣！」融亦以為然，遂麾兵使卻。秦兵遂退，不可復止。謝玄、謝琰、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。融馳騎略陳，欲以帥退者，馬倒，為晉兵所殺，秦兵遂潰。……初，秦兵少卻，朱序在陳後呼曰：「秦兵敗矣！」衆遂大奔。（卷105，頁3311—3312）

當謝玄設謀欲藉秦兵稍退以趁勢啣尾追擊時，前秦諸將並非無萬全之計，惟苻堅始終驕傲輕敵、過度自信，卒使晉軍有機可乘，遂大敗之。其實，如不局限於太元八年的「肥水之戰」，苻堅之慘敗於肥水，其端倪更早見於晉孝武帝寧康三年（375）輔佐苻堅開國的奇士王猛之臨終遺言：「晉雖僻處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和，臣沒之後，願勿以晉為圖。鮮卑、西羌，我之仇敵，終為人患，宜漸除之，以便社稷。」（卷103，頁3269）以及太元五年（380）八月，前秦祕書侍郎趙整藉由侍宴而援琴以歌示警：「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勞舅父是仇綏，尾長翼短不能飛。遠徙種人留鮮卑，一旦緩急當語誰！」（卷104，頁3297）當時識者皆知東晉雖偏安江左，而政治安定，不宜侵軼；前秦雖一統北方，卻有各族乘間動亂的政治隱患，惟苻堅始終不聽勸言，忽視其內部之致命威脅，卒於肥水之戰中取敗，帝國隨之崩解，其人亦因之死於羌人姚萇之手。

